

陆 阳 著

無
錫
國
專

江
大
方



无锡国专

陆 阳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无锡国专 / 陆阳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506-1084-2

I. ①无… II. ①陆… III. ①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史料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6280号

书 名 无锡国专
著 者 陆 阳
策 划 无锡凤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 编辑 卞 岐
出版 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 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 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印 刷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无锡市扬名高新技术产业园B区75号,邮编:214024
开 本 850×1168毫米 1/16
印 张 33
字 数 523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084-2
定 价 7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0-85435666)

大哉！无锡国专

武力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也必然包括其文化的复兴，对中国这个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今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即显示出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当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即将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必然成为21世纪上半期世界文明发展中的最重大潮流。而中国文化的底蕴和精髓，正如前述《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走向衰落后，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不甘沉沦，开眼看世界，奋起直追，博采众长，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形成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迎来了中华民族

目 录

序 大哉! 无锡国专 1

凡例 1

第一章 初创 1

三个人的谋划 1

风起云涌的国学运动 12

相伴相生的国学教育 28

第二章 校长 45

读经明理 45

一心维新 53

东西学并重 65

正人心, 救民命 77

“新”与“旧”的“拔河” 91

第三章 书院 133

口试与笔试 133

仅此三五人 137

书院式的学校 145

唐调, 因声求气 149

写, 代圣贤立言 158

切磋与讨论 163

走出国专以后 172

第一章 初 创

三个人的谋划

1920年冬，刚从南洋大学校长职位辞职回到无锡寓所没多长时间的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1865—1954），再度“出山”了。

在南洋大学担任庶务长的陆勤之（名起，字芹芷、勤之，1867—1948）来到无锡，在表达看望问候之意的同时，转述钱塘施肇曾（字鹿珊，号省之，1866—1945）的口信，延请唐文治出面主持即将创办的一所专门讲授国学的学馆。

对这一邀请，年届56岁的唐文治十分兴奋，认为此事于己“责无旁贷”，但其时他因眼疾日深而双目失明，所以对于出任主持颇感“力不从心”，陆勤之当即自告奋勇表示担任总干事，全力



唐文治

协办馆中事务。唐文治遂应允。

唐文治在《自订年谱》中对国学馆的创办有较为详实的描述：

十二月，钱塘施君省之名肇曾，托友人陆君勤之介绍，嘱余在无锡开办国学专修馆。定开办费八千元，常年经费每年一万元。余思讲学家居，平生之志，爰订定学规章程。托蔡生虎臣租借锡商山货公所楼房两幢为教室宿舍，地在锡山之麓。即于无锡、上海、南京三处招考，报名者近千人，取定师范生额二十四名，附额六名。¹

这里提到了一个人：施肇曾。在当前几乎所有记述或回忆无锡国专的文章中，对施肇曾的介绍语焉不详。



施肇曾

施肇曾，祖籍浙江钱塘。其先祖于清初迁居江苏苏州震泽镇。施氏繁衍生息，世代为丝商。据施肇曾之弟施肇基回忆：“先君静庵公在乡经营收集转运之事，先伯少钦公在沪与洋商直接交易，时人称为丝通事。”²在经商获利之后，施氏乐善好施。静庵公“与乃兄少钦公种善树德，有声于时”，“凡有贫困来求者，靡不分金指困，如其愿以去”。³

施肇曾幼年受传统教育，稍长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并在上海电报学校专学英语兼学时事。唐文治称其“髫龄嗜学，读四子五经外，旁逮诂卢文字，罔不覃思精研，探厥奥突”。⁴

青年时，施肇曾与施氏各子弟奔赴全国各地投入救灾赈灾。

光绪十九年（1893），施肇曾随杨儒（字子通，？-1903）赴美，后任纽约正领事官。在美期间，目睹中西之别，“阅历既深，爰拟采他国之长，以补吾国之绌”。⁵

光绪二十四年（1898）归国，参与我国早期铁路的建设。任湖北汉阳铁厂提调，兼办京汉铁路工程；后任沪宁铁路总办，兼任招商轮船总局董事；后又任沪杭甬铁路总办、京汉铁路南段会办。民国元年（1912），督办陇秦豫海铁路事宜，任陇海铁路局局长。1916年时还兼管同成铁路事宜。

从1920年起，先后任驻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巴东、英国伦敦、新加坡、吉隆坡、惠灵顿等地的领事，并兼任驻葡属帝汶岛领事，直到1936年结束海外领事生活。

施肇曾诚信守义，且人脉亨通，在从政的同时，投身实业界和金融界，取得成功。1915年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两年后为中国银行董事，又创办北京新亨银行和上海永亨银行。1918年还创办北京中央医院。此外还创建上海市闸北水电公司，在故乡震泽创办江丰农工银行，建办震泽缫丝厂。

在实业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施肇曾急功近义，大力兴办慈善。“为扩义滂仁之举，凡遇各省水旱、凶荒、兵灾、疾疫，抚循噢咻，发粟授衣，不可偻指计”。如在唐文治家乡太仓，历年来“迭被灾祲，贫穷无告”，施肇曾屡施救济乡亲们对其义举，感怀在心，“口碑载道”。“此外，他与南浔富绅庞莱臣（1864-1949）合资，各捐一万元，沿运河边筑成一条纤道，解决震泽与南浔之间的交通问题；又于1923年与从兄施子英（名则敬，1855-1924）及庞莱臣“捐资重建浔震石塘十二里，接筑平望、梅堰塘工，倡捐巨金，首尾五载工竣，水漱不淫，桑土以安”。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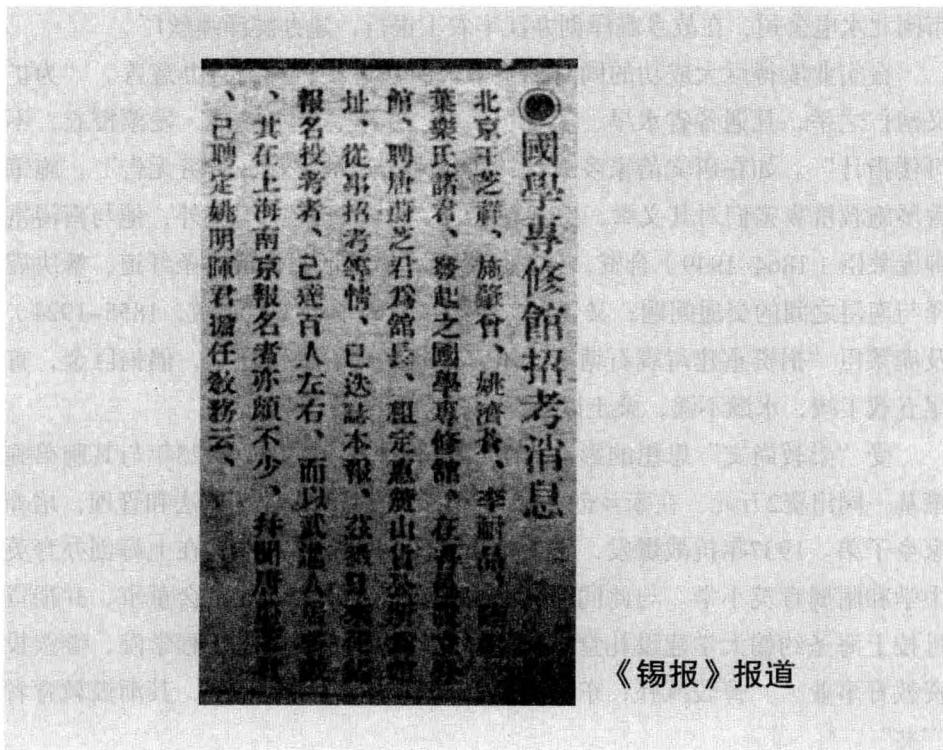
受“崇教尚文”思想的影响，施肇曾十分关注教育。1923年与其胞弟施肇基一同出资2万元，在家乡创办震泽中学，采用现代教学方法和管理，培养家乡子弟。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被迫关闭。1938年，他又在上海创办育英中学和附属育英小学。与此同时，施肇曾还任光华大学校董会董事，并捐资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建设礼堂，捐资兴建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继续投资教育事业。“菁莪棫朴，东箭南金，树木树人，项背相望，其渐被教育者广矣”。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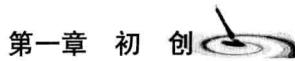
当然，施肇曾兴办教育，最让后世颂扬和钦佩的就是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

1920年12月13日，无锡的《锡报》刊登了《国学专修馆招考消息》，对国学馆的创办作了报道：

北京王芝祥、施肇曾、姚济苍、李时品、陆起、叶乐氏诸君发起之国学专修馆，在吾邑设立分馆，聘唐蔚芝君为馆长，租定惠麓山货公所为馆址，从事招考等情，已迭志本报，兹悉日来在锡报名投考者，已达百人左右，而以武进人居多数，其在上海、南京报名投考者亦颇不少，并闻唐蔚芝君已聘定姚明晖君担任教务云。

王芝祥（1858—1930），字铁珊，直隶通县人。原系北洋军阀，后加入国民党，并任国民党理事。晚年曾任中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姚济苍（生卒年不详），字博施，四川人，名道士，精通医术，且擅国学，曾任北洋军阀陆军部咨议。陆起，即陆勤之，曾协助唐文治在上海实业学堂办学。李时





品，曾任北京孔教会总干事。叶乐氏的情况不详。

姚明晖（1881—1961），号孟埙，上海南翔人。民国元年（1912）起，历任江苏省立苏州、扬州、淮安等地师范学校校长和筹办员。1915年起，历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副主任、代理校长。后历任上海暨南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持志大学、上海大学等校教授及正风文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专事学术研究。姚明晖曾编著多种中外地理教科书及文史、地方志、音韵学等著作。已出版的有《中国近三百年国界图志》、《中国民族志》、《汉书艺文志注解》、《中国发明地图百证》、《反切源流考略》、《声韵学说明详解》、《学记集义训诂》、《禹贡注解》、《上海乡土地理》、《蒙古志》等。

这篇报道，与后来的事实有所出入，王芝祥、姚济苍、李时品、叶乐氏等人均未参与创办国学专修馆，姚明晖也没有到国学专修馆任教。

不过，姚明晖与国学馆有过学术上的交流。据查，在1922年初举行的国学馆新校舍落成典礼上，姚明晖是到会嘉宾之一，并作演说。⁹

可见，国学馆在创办初期系由施肇曾出资，而馆务则由唐文治一手策划经营。

在筹办期间，唐文治还曾谋求时任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1855—1939）的襄助。唐文治与徐世昌同为满清官僚，在商部时唐文治为右侍郎，徐世昌则为左侍郎，两人的私交甚好，意气投合。徐世昌允诺解决国学专修馆学生的毕业出路，由政府进行安置。

国学馆一届毕业生王蘧常《自传》：“……一九一九年秋，闻前交通部工业专校校长唐文治先生在无锡创办国学馆……得其同年当时大总统徐世昌之襄助，馆生毕业出路，由政府规定：甲，部曹；乙，各省县知事；丙，大中学教师。又有资助馆生膳宿书籍及膏火（即奖学金）者，皆于招生广告载之。名额二十四人，不拘年龄……”¹⁰第三届学生、后在国专任教的钱仲联在《钱仲联学述》中也提及：“办学起因是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前清翰林徐世昌打算通过该校招收一批旧学根底较好的学生，为政府培养秘书人才。”¹¹

不过，未及第一届学生毕业，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徐世昌被迫下台，国学馆毕业生由政府进行安置这一承诺并没有真正变为现实。但是，国学馆的毕业生就业倒并没有影响，前三届学生中大多



进入大学、中学任教。

谋划创立国学馆的唐文治、施肇曾与陆勤之，三人之间颇有渊源。

此三人年龄相近，皆是江苏太仓人氏，均出生于清同治年间，年岁只相差两岁，又都受业于太仓王祖畲门下，有着同乡、同龄、同门之谊。王祖畲（1842—1918），字岁三，一字紫翔，号漱山，光绪九年（1883）进士，中年后肆力古文，以《史》、《汉》、韩、欧为宗，曾主讲宿迁、海门、崇明各书院讲席。辛亥革命后，忧伤而死。门人私谥文贞。著有《礼记经注校证》、《经籍举要》、《读左质疑》、《论语读本》、《读孟随笔》、《（民国）镇洋县志》等十数种。

在执掌无锡国学专修馆之前，唐文治执掌南洋公学14年。南洋公学在清末时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唐文治担任学堂监督（校长），急需人才，连发三次电报紧急招揽时任佐理哈尔滨道署的陆勤之。陆勤之欣然南归，宣统二年（1910）冬到校就任庶务长，负责学堂总务工作。1912年，民国成立后，改实业学堂为南洋大学，唐文治、陆勤之同赴北京，面晤交通部（时邮传部改为交通部）总长施肇基，请求帮助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唐文治对陆勤之赞赏有加：“余倚之如左右手”。两人后来更是成为儿女亲家。

这位施肇基（字植之，1877—1958），就是国学专修馆创办人施肇曾之弟，早年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是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曾任哈尔滨海关道、滨江道道台，与俄国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谈判，几经交涉接收俄国设立的水利会，收回了松花江的航行管理权，陆勤之就是在此时北上哈尔滨就任佐理道署的。1919年施肇基出席巴黎和会，与陆征祥（字子欣，1872—1949）、顾维钧（字少川，1888—1985）、魏宸组（字注东，1885—1942）、王正廷（原名正庭，字儒堂，1882—1961）一起为中国五位全权代表之一，后成为中国第一位驻美大使。

1920年的冬天，天寒地冻，草木萧条，无锡国专这一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唐文治、施肇曾和陆勤之三个人看似“简单”的谋划下，开始“生根发芽”。

那么，国学专修馆何以选址无锡这个江南水乡小城呢？

探究个中原因，似乎很简单：一则机缘凑巧，唐文治的寓所在无锡；二则无锡“文脉绵长”，工商业发达，不论是商人还是百姓，对教育有着很高的热情。

尚文重教、修德成性之风，在无锡延绵流传，蔚然成风。到了清末民初时期，无锡的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一时特别兴旺发达。出生于无锡的国学大师钱穆（字宾四，1895—1990）在其回忆录《师友杂忆》中谓：“晚清以下，群呼教育救国，无锡一县最先起。”“无锡一县在江南开风气之先，如埃实、东林两学校，远在前清光绪戊戌政变前，为全国兴办新式学校之开始，规模皆极宏伟，科学仪器亦极齐备。”¹²埃实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办人是时称“梁溪七子”之一的杨模（字范甫，1852—1915），校名出韩愈《答李翊书》中“养根而俟实”之句，是江苏省开办最早的高等小学，杨模自任总理（校长），聘请著名数学家华蘅芳（字若汀，1833—1902）为总教习，教师亦皆一时之选。东林小学的前身是历史上闻名的东林书院，在近代“废天下书院为学堂”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东林改为学堂，第二年，东林选派顾倬（号述之，1872—1938）和侯鸿鉴（字葆三，1872—1961）去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一年。顾倬回国后任东林小学校长，仿效日本办学，施教新学。除了埃实、东林以外，近代无锡最早的新学堂，还有俞复（字仲还，1866—1931）、吴眺（字稚晖，又字敬恒，1865—1953）等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的三等学堂。这些新学堂创办以后，虽然曾遭到过旧势力的阻挠，比如光绪三十年（1904）的“毁学事件”，但办新学已成为大势所趋，无锡城乡掀起了办学高潮。至宣统三年（1911），同城而治的无锡、金匱二县先后共办学堂120余所。

新式学堂的兴起，与无锡一贯发达的工商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光绪二十一年（1895），杨宗濂（字艺芳，1832—1905）、杨宗瀚（字藕芳，1842—1910）兄弟首创业勤纱厂，这是无锡近代工业的发轫。光绪二十八年（1902），荣宗锦（字宗敬，1873—1938）、荣宗铨（字德生，1875—1952）兄弟办起保兴面粉厂，光绪三十年（1904），周舜卿（名廷弼，1852—1923）创办裕昌丝厂，无锡近代的纺织、缫丝、面粉三大主要行业率先起步。到了三四十年代，无锡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轻工业城市之一，工商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并形成了杨氏、荣氏、周氏、唐程（唐骧庭、程敬堂）、唐蔡

（唐保谦、蔡缄三）五大民族资本产业集团。¹³这些引领近代工业的士绅们，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热心于赞助教育事业。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就曾言，当时无锡的新式学堂，“皆由地方人士私费创办”。¹⁴“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¹⁵钱穆在《师友杂忆》举的例子，包括无锡巨商荣德生创办江南大学，以及“无锡巨商唐家，请太仓唐蔚芝来无锡创办一国学专修馆”。¹⁶后一说自然并不准确，最早动议并出资兴办国学专修馆的是钱塘人施肇曾，但后来跟进的，确以无锡士绅为主。

无锡在新式教育上开一时风气，同样，无锡的经学发展颇为昌盛，经学传播颇为广泛。据考，早在汉武帝时，吴地学儒读经之风渐盛。到了东汉，“通经”成为当时选拔人才的察举征辟制度的一项重要条件。在此影响下，无锡的经学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王关和高彪、高岱父子等一些较有名望的经学家。王关，精于《易经》和天文，深受东汉光武帝刘秀赏识，先是任命他为山阴令，补侍御史迁冀州牧，后又将他拜为谒者、仆射，居朝廷最高官位。¹⁷高彪，曾游学于洛阳太学研读儒家经典，有雅才但讷于言，郡里推举他为孝廉第一，朝廷授以郎中，校书东观（洛阳宫中藏书、修史之所），汉灵帝对他的才识深为赞赏，将他迁升为内黄令，并下诏在东观为其画像。¹⁸高彪之子高岱，精通《左传》，东汉末年隐居于浙江余姚，据有江东的孙策慕名命会稽丞陆昭将他请来，与他讲论《左传》。由于奸人构陷，高岱年仅30多岁就遇害身亡。¹⁹

到了宋元时期，随着长三角地区成为全国经济中心，无锡逐步形成了由州县学、民间社学、书院、私塾组成的完整教育体系。所有这些学校，不论是官办的、民办官助的还是民间办的私学，其讲学内容都是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理学。北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无锡县城内首次正式建立了学官。²⁰书院，于宋时更为大盛，有东林书院、崇正书院和建于惠山第二峰下的遂初书院。其中最负盛名、影响最大的是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的创建者是理学传人、宋代大儒杨时。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北宋皇佑五年（1053）生于福建将乐，北宋熙宁九年（1076），杨时24岁时以太学生的资格考中进士。为了探求经义，杨时曾先后投拜著名大儒、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为师。经过长期的苦心钻研，杨时成为二程理学的主

要传人，被东南学者奉为“程氏正宗”、“东南夫子”。²¹杨时学成后，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及荊州州学教授，并到常州和无锡讲学，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在无锡东城创建东林书院。自此开始，直至南宋建炎三年（1121）正式回到福建将乐故里，杨时在东林书院讲学18年。

明清时期，无锡的经学日益兴盛。有明一代，有尚德书院、二泉书院、城南东林书院和修复重建的原东林书院等。尚德书院和二泉书院均位于惠山，均系官至礼部尚书的无锡籍学者邵宝（1460—1527）晚年创建。城南东林书院，也是由邵宝及其门人创建。明成化年间，邵宝看到宋代东林书院旧址被占为僧舍，就在城南保安寺后聚徒讲学。邵宝外出为官后，其门人在讲学之地建立书院。明万历年间，顾宪成（1550—1612）、高攀龙（1562—1626）等人在宋代原址修复重建了东林书院，并讲学其中，成为当时无锡乃至在江南地区和全国都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书院。²²

当时，院中建有专门用以藏书的“典籍室”，除四书五经外，还收藏有二程、杨时、罗从彦、尤袤、李祥、邵宝等的大批儒家经典和与东林书院有关的儒学先贤的著述文集。东林书院在讲学中虽把学术活动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但就其讲学内容而言，仍主要是四书五经。东林讲学，每次都由主讲者先说《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中的一章，然后就采取答辩方式“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进行集体讨论。学人常就《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中的有关章节内容提出问题，也兼而就一些先哲、贤儒、君王、名臣等人的事迹、语录、懿行、学术见解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释难辩疑。在东林讲学中，被反复强调的儒家经典著作有《周易》、《大学》等。此外还有宋代大儒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程颐的《识仁篇》，以及《河洛图书》、《八卦九畴》等。东林讲学不仅吸引了无锡的大批士林学人参加，而且江南地区和全国各地的大批学人也云集而至，“四方学者观海来游”，院内学人多至“背趾相错”，致使“学舍不能容”。²³

明朝末年，魏忠贤（1568—1627）阉党专权乱政，东林党人遭到迫害，东林书院被毁。崇祯即位，惩处阉党，昭雪东林诸人，并下诏修复书院。经明崇祯朝以及清代各朝的屡次修葺，东林书院复还旧观。到清朝康熙年间，东林书院再度成为培育经学人才的重要场所，书院原有正额内课童生18名，外

课童生38名，乾隆末年又增加内课童生15名，后又增加外课童生25名，此后学生还不断增加。除东林书院外，清代无锡还有锡山书院、书海书院和共学山居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风尚，得以流传和光大。

从无锡延伸开去，整个江南地区，国学的氛围一直很浓厚。“有清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所占。”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江南地区的文人们形成了追求客观、科学的传统与精神：“衷求是之旨，藉考据之法，罗证事实，勘比异同，则固清儒之所以治学之精神、之方法也。”²³特别是在清末民初，在西学的参照下，江南的文人学者更是捕捉到了时代变化的脉搏。“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²⁴

由此观之，如斯深厚、浓郁的经学之风，对于将“讲学家居”作为平生之志的唐文治来说，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事实上，无锡国专在办学过程中，时时以东林学院为参考样本和追摹对象。

在唐文治允诺执掌国学专修馆的那一年，他其实已经参与了无锡的现代中学教育，成就了无锡教育史上一段“毁家兴学”的佳话。

1920年4月，无锡人高阳听说唐文治已提出辞去南洋校长职，登门拜谒唐文治，表达了捐资办学的意愿，并敦请唐文治出任校长。唐文治不仅欣然答应出任校长，还恳切申明不拿薪金，纯粹尽义务。

高阳（1892—1943），字践四。1914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同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读经济，1916年获硕士学位，与唐文治长子唐庆治曾为同学。其父高秋荃，是一位学徒出身的实业家，常以幼年时未能多读书为憾事。他成为实业家后，一心要创办一所学校。1920年2月，老人去世。高阳决心继承父亲遗志，捐出家产创办一所完全中学。1920年秋天，学校暂借西水关马氏宅第开学上课。同时筹备自建校舍，开始地价每亩350元，后却涨价到700元，建校预算因此一再突破。而这时高阳持有的价值30万元股票却一再下跌，所值无几，办校面临危机。为了继续建校，高阳卖掉了无锡的全部资产，但经费还是不够，高阳又毅然卖掉了上海、无锡的自住豪宅，其中上海的“高公馆”有1200平方米左右。房产卖光后，自己竟然租屋居住。高阳兴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慷慨解囊”，而是以毁家为代价，闻者无不为之感动。

唐文治对高阳的义举十分敬佩，在无锡中学任职10年分文不取，而且全心全意不遗余力，亲自为学校制定章程，撰写校歌，聘请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其中不少是自己的亲友和弟子。唐文治还每两周到校讲学，全校师生集中在大礼堂聆听。教师发现优秀的学生作文，就推荐给唐文治评阅，唐文治认真地加上评语，并写上“蔚芝加评”，这在学生看来是很大的荣誉。抗日战争期间，无锡中学校舍大部分毁于战火，被迫迁到上海租界。当时唐文治已不担任学校校长，无锡中学在招生广告上仍然刊印“校长唐文治”。唐文



治说：“若能把学校办好，借用吾名，不吝也。”

高阳先后在暨南大学、中国公学等校任教，后出任民众教育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前身）院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高阳和唐文治长媳俞庆棠（1897—1949）一起率领该院师生迁校广西桂林复课。1941年出任广西大学校长，不到二年竟积劳成疾，因两袖清风无钱入医院治疗，不幸于贫病交困之中溘然长逝，享年只有52岁。唐文治闻此噩耗“大骇恸”，在所作《无锡高君践四家传》中发出长叹：“以高君之声誉名位，而困厄若斯，岂所谓竟死不伸，孰劝为善者耶？呜呼，胡天忌才之酷耶？”²⁵

在此，回头再叙述唐文治寓所设在无锡的前因后果，这其间也有一段佳

话。

据国学馆四届毕业生许岱云（生卒年不详）介绍：唐文治的父亲唐若钦先生“很有学问，但一生不得意，只是靠授徒课读为生。老先生品格高尚，喜欢游山玩水，过悠游自在的生活。他老人家欣慕无锡山明水秀，风景优美，有定居无锡的意思。此事恰为无锡周舜卿先生所知道，周舜卿是唐文治的知友，他深悉唐先生非常孝顺父母，很听从父母的话，一定会定居到无锡来，便主动送给唐先生荷花荡前西溪一块基地。唐先生坚决不肯接受，但愿意买下这块基地。唐先生屡次持款给周舜卿，周又屡次璧还……后来，周舜卿先生去世了，唐先生向周的长子周肇甫再三表明自己的心迹，才以三千元代价买下这块基地，始筑‘行素堂’，定居无锡。”²⁶

风起云涌的国学运动

唐文治创办无锡国专的1920年前后，正是国学思潮风起云涌、新旧冲突的阶段。

回顾我国的近代国学研究，从1902年梁启超谋创《国学报》始，到20世纪50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或合并或停刊止，历经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国学研究大致经历了“艰难自救”和“整理国故”两个阶段，无锡国专的创办正值这两个阶段转换的时间点。

光绪二十七年（1901），大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在军事、法律、财政、行政、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体制改革。其中，教育改革是“新政”各项举措中颇引人注目的一项。正是这次改革，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各级各类的现代学制系统，从而直接引发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向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转换。

“新政”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广设学堂以培养人才。之所以如此，实与清廷上下为挽救统治危机、急图富强之才有关，“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